

◀ (上接5版)

徐俊:您三位都是六十年代北大历史系毕业的,后来都去了陈先生门下。讲讲陈先生和北大诸位先生之间的不同和渊源吧。

李锡厚:邓先生呢,北大历史系毕业的学生都怕他,但毕业之后学生对他感情最深。我做毕业论文的时候,写完了交给他,他说你重写。我说这马上就要分配了,没时间了。他说那你这最多四分,那时是五分制。我说四分就四分。他是一个字一个字改,批得密密麻麻的。陈先生好像没有那么严格。

康鹏:陈先生给学生改文章吗?

李锡厚:他不改,你写完了,他看了之后,谈一谈他的看法。不像邓先生那样改。

李勉:当时读辽史金史,用的是什么版本呢?

刘凤翥:辽史用的是中华书局的《四部备要》,《金史》用的是殿版,都是用朱砂点的。

李锡厚:当时买商务的百衲本买不到。

李勉:陈先生自己看的是什么版本?

刘凤翥:可能是百衲本。他买书花不少钱。我上研究生时他从旧书店买到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。

李锡厚:陈先生用的《观堂集林》,是花钱找人抄的,一个字一个字抄,然后钉起来,我看到过。

徐俊:我看过他的手稿,2006年前后,去民院他们家看的,陈先生的《金史拾补五种》《辽史拾遗五种》。当时交过目录说要编文集。

林荣贵,1940年生,广东饶平人。196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。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民族系,师从陈述教授,1981年毕业并获硕士学位。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从事东北民族史研究工作。后转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。主要研究领域是辽史、东北民族史。主要研究领域为辽史、东北民族史、边疆史。

徐俊:三位后来都做辽金史、民族史,北大民族史老生对你们有什么影响?

刘凤翥:我们当时的中国通史,辽金是邓先生讲的。先秦是张政烺先生,从北京猿人一直讲到秦朝统一。第二学期就不行了,给张政烺先生贴大字报,就给撵到你们中华去了嘛。

李锡厚:民族史当时在北大不受重视。辽金史就是在上通史课的时候一带而过的。

苗润博:能不能理解为上世纪60年代北大历史系还没有民族史的传统,80年代以后才慢慢建立起来?

刘凤翥:对。后来是张广达、余大钧他们才建立起来的。

徐俊:刚才讲到的邵循正先生呢?

刘凤翥:他讲近代史。

李锡厚:邵循正先生早年是做蒙古史、元史,中国元史的权威。最早做波斯文,中国最早介绍拉希德丁《史集》的就是他。

徐俊:是怎么想去学辽金史、民族史的呢?是在北大种下的种子吗?

刘凤翥:不是想学。那时教育部是计划分配,一再说国家经济困难,除了医学、会计等短缺人才之外,其他专业都过剩,给你们分配工作,分到什么算什么,除了医学和财会,都要做好改行的准备。我们学了五年的历史,改行舍不得啊。考研究生是一个缓解工作压力的机会。我报了好多人的研究生。先是报了古典文献专业魏建功先生,一开始说不管本科是哪个系的都可以报,后来说不行,只在中文系招生。我又报了于省吾的古文字专业,还报了汪钱的隋唐史的研究生。我跟沙宗复一起报的。汪先生说,不行,我不喜欢你们两个,你们让秦文炯来报。我们说为啥不喜欢我们了?汪先生说你们学的不是历史的本行,说我学的金文甲骨,是“旁门歪道”出身。我就是在图书馆借过一份《殷墟文字类编》,手抄了一本,批白专的时候被贴大字报上写过,连老师都知道了。说沙宗复呢根本不务历史的正业,搞些闲闻轶事,雕虫小技。我就问汪先

生,什么是“历史的本行”?他说历史的本行就是政治史,我跟陈寅恪先生学的时候都住他家里,必须跟先生想法一致才行,我就跟陈先生想法一致所以能住到陈先生家里。回宿舍我们跟秦文炯说汪先生让你考他的研究生,他说我才不考呢,要早点工作给家里解决困难。后来汪先生说他不考研究生也得给我留下,就让他留在北大了。陈智超听说民族所的陈述先生也招研究生,让我去考。我心想我历史系的,去什么民族所。陈智超劝我先报个名,他认识陈述先生家,跟他姑姑家是邻居(傅乐焕是陈智超的姑父),他说我把你领到陈述先生家门上,你跟他谈一谈,看看对头不对头。这就是我开始讲到的,考研究生之前,首次拜谒陈先生。多亏是考了民族所,政审没那么严,我就考上了。

李勉:李先生和林先生考研究生是哪一年?

刘凤翥:1978年。

林荣贵:当时是个机遇,考上研究生等于考上北京户口,我也没想到我能考上。同届的还有李锡厚、赵光远、高路加、景爱,一共五个人。陈述老师为人非常厚道,接触下来,从来没有因为意见不一样而跟我们有什么隔阂。我刚来民族所,第一篇文章是在《民族研究》上发表的,送给大师兄刘凤翥看。导师跟师兄,都非常爱护我们。

李锡厚:林先生对陈述先生,是帮忙做了好多工作的。像我知道的,查《册府元龟》,林先生做了好多工作。

林荣贵:他做《辽文汇》,和辽代碑刻拓片要核对,有一次跟我说,留了好多拓片给我(核对)。拓片都是一张纸一张纸的,要查很麻烦。我原来在承德避暑山庄工作,认识一个姓王的小同志,我帮过他,关系很好。后来这个小同志到北京,在图书馆里管理拓片。我就请这个同志帮忙,为后来核对拓片提供了很多便利。两万多张拓片,一天能搬出几百张来让我们查。我做这个做了一两个月。

李锡厚:方志跟拓片核对。比如避讳问题,清代修的方志里收的辽碑,避清讳,所



与学生在民研所门前,左起为林荣贵、李锡厚、赵光远、高路加



与学生景爱(左)、高路加(右)在书房

以要对原拓。所以这个书里林先生有不少功劳。

康鹏:《辽史补注》里还引了大量的方志,这些方志是陈先生自己核的吗?

李锡厚:他(指林荣贵)和赵光远都帮陈先生查过。

四

刘凤翥:你们二位(苗润博、康鹏)参加《辽史》的修订工作,在修订工作之前也看过《辽史补注》的稿子,有什么想法、看法,你们也谈谈。

康鹏:老先生做学问,资料确实是一本本翻出来的,竟然比我们检索获得的资料还要多。陈先生功力非常深厚,他引的文献,很多我们现在都检索不出来,他都一条条列上。感觉就是很偏僻的资料他全部都能看到。可能跟体例有关,宁繁勿简嘛,发现一条材料,他就放在那里,包括明代的,清代的,辽代以前的资料,全部都列上去。我现在看到的陈先生去世前运用的最后一条材料,应该是耶律习涅墓志,《考古》1991年第四期发表的。

苗润博:感觉陈先生在补注的过程中,他自己的观点也一直在变。一些关键问题,比如他四十年代写疏证稿的时候是一个观点,他八十年代改成政治史稿的时候又是一种观点,《辽史补注》是他对于一

些问题的最后的想法,可以看出他自己学术思想的流变是特别明显的。有些问题,他在做《辽史补注》的时候会对自己之前的观点进行批判,我觉得这一点非常难得。到生命结束之前还在对自己的学术进行反思,这种精神在这本书里体现得特别明显。他一直在以今日之我攻昨日之我,一直在反思自己之前是否是正确的。这种态度本身就是特别值得后辈学习的。

以前在修订《辽史》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况,比如原来点校本的一些错误,其实在《辽史补注》里已经纠正了,陈先生会说,我以前是怎么想的,现在我认为这是不对的。他不惮于修正自己的错误。

《辽史补注》不光是对于研究辽史的价值很高,对于研究辽史的学术史,包括陈述先生的学术思想史,价值也是非常高的。

刘凤翥:1948年出的《契丹史论证稿》里,他说契丹小字是以回鹘字拼写的契丹语,其说别详。他根本没有机会把这个观点“详”一下,因为事实并非如此。那个时候都认为哀册是契丹大字,认为契丹小字都是回鹘字母拼写的契丹语。他后来不再这么说,因为哀册是契丹小字。现在,什么是契丹大字,什么是契丹小字,都很清楚了。随着学术的进展,陈述先生认为哪一个学说更合适,就遵从哪一个学说。

